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活动史(1898-1956)

赵永华 著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

活动史(1898-1956)

赵永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赵永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618-1

I. 在…

II. 赵…

III. 俄文-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898—1956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0088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 (1898—1956)

赵永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0.12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8 00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众多的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新闻传播活动，办报，办刊物，办通讯社，充当本国政府、本国的某一个政党、某一个政治派系、某一个经济利益集团、某一个宗教团体的喉舌，充当他们在华的某一部分侨民的喉舌，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弘扬他们母国的文化，维护他们相应的权益，传播和报道他们共同关注的信息，这在旧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世界上还不曾有一个国家，像旧中国那样，容许那么多的国家和那么多的外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不受任何拘束地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从事他们自己的新闻传播活动，特别是办报办刊活动。

在众多的在华外国人用自己的母语创办的报刊中，俄文报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它们起始的时间，和其他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刊比较起来，并不算早，但从它们的数量和它们在当时的影响来看，却超过法文、德文和葡文的报刊，仅次于英文和日文报刊，居在华外文报刊中的第三位。这一批俄文报刊在中国活动的时间，肇始于19世纪的90年代，终止于20世纪的40年代至50年代，绵延近半个世纪，出版的地点，则遍及东北、华北、华东的几大城市，而且颇具规模，是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

但是，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国内各图书馆的收藏不足等原因，长期以来，这一群体报刊的研究，没有受到重视。除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赵敏恒的《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和新近出版的《东北新闻史》等个别专著，设有专节专目作过简单的介绍外，多数中国新闻史的专著都

很少涉及，或虽有涉及而语焉不详。这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严重的缺口。

本书作者的这部《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填补了这一重要的缺口。这部书除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在华俄文报刊面上的情况作了综合考察之外，还选取了一家在华出版时间最长且最有影响的俄文报业集团“连比奇的‘柴拉’报系”，和它先后出版的《霞光报》（1920年创刊于哈尔滨）、《上海柴拉报》（1925年创刊于上海）、《俄文霞报》（1928年创刊于天津）这三家报纸，作了深入的个案剖析。回答了本书前言中提出的“在华俄文报刊何时诞生？”“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办起来的？”“它们沿着什么样的轨道向前发展？”“沙俄在华新闻事业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过程如何？”“它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办报活动有那些特色？”“怎样在复杂动荡的局势中求生存图发展？”“苏联在华新闻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容和形式有那些特点？”“中苏关系对俄文媒体有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第一部全面研究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历史特别是在华俄文报刊历史的专著。它的出版，不仅对中国新闻史、沙俄新闻史和苏联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中俄中苏文化交流史、在华俄侨史和跨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和本书作者初识于20世纪末，有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学术上的切磋和交流。她恂恂谦逊，胸怀皓洁，积学酌理，博闻强记，长期浸润于中俄两种文化之间，对两种文化都有较深的造诣。为了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她投入了近四年的精力，走访了多处在华俄文报刊出版的重点城市，并利用以访问学者名义赴俄罗斯访问的机会，用一年的时间，在莫斯科等地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能够找到的在华俄文报刊的原件，为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就是她的研究成果。这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相信它的学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日益彰显，日益为学者们所认同。是为序。

方汉奇

2004年7月23日于北京宜园

目 录

前言	/ 1
----	-----

第一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背景 / 7
第一节	十月革命前俄人来华的历史追溯 / 8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在华俄侨的历史概况 / 12
第二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渊源 / 23
第一节	沙俄在华新闻事业对其国内报业的延伸 / 24
第二节	境外侨民报刊对俄国报业的继续 / 34
第三节	苏联官方新闻传播活动 / 37
第三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初创期 (1898—1917) / 46
第一节	在华第一份俄文报纸 / 47
第二节	沙俄在华的新闻事业 / 54
第三节	沙俄控制下的民办俄文报刊 / 61
第四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繁荣期 (1917—1931) / 71
第一节	哈尔滨俄文新闻传播的繁荣 / 72
第二节	上海俄文新闻传播的发展 / 102
第三节	苏联在华的新闻传播活动 / 107



第五章	20 世纪 30 年代在华俄文新闻传播重心南移 / 115
	第一节 哈尔滨俄文新闻传播的衰落 / 116
	第二节 上海俄文新闻传播的繁荣 / 127
第六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转型期 (1937—1945) / 143
	第一节 苏联记者的新闻活动 / 144
	第二节 上海沦陷后的俄文传媒 / 146
第七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逐渐弱化并终结 (1945—1956) / 154
	第一节 俄文新闻传播在上海的终结 / 155
	第二节 俄文新闻传播在东北的终结 / 159
第八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代表： “柴拉”报系 / 167
	第一节 “柴拉”报系的第一份报纸： 哈尔滨《霞光报》 / 168
	第二节 “柴拉”报系的第二份报纸： 《上海柴拉报》 / 194
	第三节 “柴拉”报系的第三份报纸： 天津《俄文霞报》 / 206
	第四节 “柴拉”报系的两位业主 / 221
第九章	“柴拉”报系的新闻业务分析 / 243
	第一节 新闻报道 / 244
	第二节 评论文章 / 268
	第三节 非新闻文体 / 279
	第四节 其他 / 288

第十章	对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总体评析 / 295
第一节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特点 / 296
第二节	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分析 / 302
参考文献 / 306	
后 记 / 314	

前言

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那是一段很少有人问津的历史，
那又是一段现在仍然可以触摸到的历史，

那是一些受命运驱使来到中国的
俄罗斯人创造的五彩缤纷的奇迹……





中国近代报刊脱胎于古代报纸，在外报的直接影响下而诞生。外报贯穿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始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外人在华办报”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在华俄文传媒是该课题中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始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关于在华外报，黄天鹏在1930年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中写道：“外人之办报也，无非藉为传道通商之助而已，后西来人士既众，乃有本国文字之发刊，以葡人为最早，计有七种，英文为最有势力，计五十余种；日文之势亦复不弱，变乱之时，国人亦多购读，据近之调查，共数在三十种以上也。其他如法如俄如德等国各有相当之言论机关，以为其外交之助，已由传教通商而兼具政治之意味矣。”^①果真如黄天鹏所言吗？在华俄文报纸都是外交之助吗？在“外人在华办报”的历史中，俄国人的新闻活动就这样简单吗？寥寥数语就能概括它的全貌吗？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据《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一书提供的资料，俄国人在华出版的中、俄文报纸共189种，杂志305种。另据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巴基奇（O. M. Бакич）的统计，仅从1918年到1945年，只在哈尔滨一地俄国侨民就出版了115种报纸，275种杂志，可见数量之多。虽然其中的很多报刊刊期很短、昙花一现、不见规模，但是，同时还有许多报刊生存了十余年之久。

关于在华俄文新闻传播的疑问很多：在华俄文报刊何时诞生？第一份报纸所属哪家？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初期还有哪些报刊出现？它们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向前发展？沙俄在华新闻事业

^①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40页，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

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过程如何？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俄侨报人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离开祖国？为什么偏偏东来中国？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俄侨的态度如何？在华俄侨办了哪些报刊？在复杂的动荡的局势中这些俄文报刊如何求生存图发展？政治立场如何？言论倾向于谁？办报业务有哪些特色？地域分布怎样？彼此之间是合作关系还是对立关系？它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如何？俄侨报刊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在中国遇到什么样的控制？俄侨报刊在日伪统治时期与日伪当局的关系怎样？在侨民的生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何时何种情况下退出中国？苏联在华新闻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具体的内容和形式怎样？在各个时期遭受到什么样的破坏？中苏关系对俄文媒体有什么影响？以上各种在华俄文传媒与北洋军阀、地方当局、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有什么样的联系？在华俄文报刊与俄国国内新闻事业的关系怎样？它们与中国的中文报刊是否有过交往？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如何？

这么多的问题新闻史学界还没有作答。不仅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是目前，国内对“在华外报”课题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英文和日文报刊上，对俄文报刊的论述不过是只言片语。已取得的少量成果大多停留在面上的描述，缺乏深入的探讨，失之简略。甚至，在不同的论著中由于作者对俄文的理解不同，使得历史人物的姓氏、报刊的名称也有了不同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对一些史实众说纷纭，即便同一出处的记述有时也前后矛盾，造成以讹传讹的不良后果。新闻史学研究上的这一薄弱环节，亟须弥补充实。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还缺乏一种开放的研究思路。对于外报的性质和作用，中国新闻史书中普遍的观点认为，外报是帝国主义的舆论工具，用来渗透其侵略政策，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其新闻活动带有刺探情报的目的。对在华外报的评价之所以过于简单，一刀切，是因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少全面周详的考量，忽视了它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俄报的研究必须突破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从全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一世界新闻传播史和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奇特的新闻现象。比如，把在华的俄文报刊区



分为沙皇御用报刊、侨民报刊、苏联报刊三大类；侨民报刊中，又细分为反苏、拥苏、中间三种，分别论述它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为在华外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以上谈及的是外报的政治方面，而外报的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就在于文化的传播。早期外报是在洋枪洋炮的伴奏下进入中国的，与此同时，外报也带来了西方的文明。这种舶来品催生了中国近代报业，把西方文化观念引入半封建的中国，也开启了外国读者窥视东方的窗口，外报在中、外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华俄文报刊的生存基础是生活在中国的大量俄国人，他们对寄居地的社会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曾经生活在哈尔滨的俄侨人数，在一段时期内甚至超过了本地人，就连俄国的货币卢布在东北地区也能够畅行无阻。正是俄国人的到来，使得曾是北方小渔村的哈尔滨变成了“东方莫斯科”。无独有偶，在上海，俄罗斯文化曾风靡一时，如今的上海仍能找到俄罗斯文化的遗迹，在中国作家的一些描写上海的文艺作品中不难寻到俄罗斯风情。在华俄文报刊的版面上洋溢着俄罗斯文化的风采。同时，它们还以自己的眼光审视着中国的古老文化。它们是传播俄罗斯文化的使者，中俄文化交流的媒介。在对其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具备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只有把选题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才能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诠释俄文新闻活动中体现出的民族特点。

在华俄文报刊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外人办报活动部分，也是俄国新闻史上的国外办报活动部分。正如我们把海外华文媒体纳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范畴一样，在华俄文报刊也是俄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在华俄文新闻传播的研究课题彰显了跨文化、跨学科、跨国别的特点。目前，在华俄文出版物问题引起了许多欧美学者的注意。在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近年来，俄罗斯非常重视对境外俄文出版物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历史图书馆、ИНИОН图书馆、社会政治图书馆、“俄罗斯境外”图书馆等部门收藏了在世界各地出版的俄文出版物和手稿。

毫无疑问，在华俄文新闻传播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题目，对它的研究将丰富中国新闻事业史、外人在华办报活动史、中俄文化交流史、中俄关系史、世界新闻史、俄国新闻史、俄侨史的内容。

本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首先是作者充分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阅读了大量俄文报纸。当时的印刷体文字与现代俄语的书写不尽相同，就像中文简体与繁体的区别，给阅报造成一定难度。

为掌握原始的第一手材料，作者曾到哈尔滨进行了调研。在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报刊在历史上曾数次遭受浩劫。1922年以前，哈尔滨一直没有收藏地方出版物的部门。1922年，经中国地方政府批准成立了东省文物研究会，下设地方出版物部。1925年进行过一次广泛的书刊征集活动，结果是1917年以前出版的报纸寥寥无几。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焚烧了敌伪时期“俄侨事务局”图书馆的藏书，把哈尔滨博物馆收藏的俄文报刊运往苏联。曾在中国出版的近500种俄文报刊中，有报纸近200种，我国保存较好的，只是那些临近解放才出版发行的俄文报纸。

作者还利用赴俄罗斯访学的机会，走遍了莫斯科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了大量俄文文献资料。近年来，一些曾侨居中国的俄罗斯人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书籍，回忆当年在哈尔滨和上海等地的生活情景。他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在莫斯科，作者走访了不少返乡的俄侨。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采取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注意到了比较方法的运用。把研究对象定位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广泛的对照，突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所处时代各种因素的关联性。

本书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

一是关于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背景、历史渊源的研究，即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主要探讨了俄人来华的历史，交代了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探究了在华俄文报刊与俄、苏国内新闻事业的历史渊源。



二是关于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发展过程的研究。在华出版的俄文报刊经历了初创期、繁荣期、重心南移、转型期、逐渐弱化到终结五个阶段。本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首先，着重介绍了在华第一份俄文报纸和沙俄在华的新闻事业，以及早期的民办报刊。然后，就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繁荣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详细介绍了哈尔滨和上海两地红、白两种俄文报刊的情况，以及非常有特色的苏联记者的新闻活动。其次，分析了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重心从哈尔滨向上海南移的原因，介绍了该阶段在华俄文报刊和俄语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再次，对在华俄文新闻传播在中国抗战期间呈现出的新特色和新的传播格局进行了论述。最后，分析了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逐渐弱化的过程，以及在华俄文报刊的终结。

三是案例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中更细致、更深层的问题。本书第八章、第九章对俄文“柴拉”报系进行了个案剖析，对它的创办背景和发展过程展开了详细的论述，评介了它的新闻业务特色。

四是对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结性评述。本书第十章对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整个历史进行了总体评述，全面总结了它的特点，分析了它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本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貌和特点，更正了以往成果中的很多讹误。三年的苦苦探索，在华俄文媒体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不是短短三年就能够劈开云雾见天日的，也不是区区二十几万字能够穷尽的。苦于档案材料匮乏，前人研究成果极少，目前只能把握它的主脉，爬梳整理出它的发展轨迹，廓清它的基本面目。更深入细致的工作还有待日后继续努力，并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第一章 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中，外文报纸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侨居在中国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华出版的俄文报，因受语言的限制，其读者受众主要是俄罗斯人。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生活的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同于英、美、日等各国，多半是十月革命后逃亡中国的俄国难民。这也决定了在华俄文报刊具有较浓的难民色彩。十月革命后，俄国流亡者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他们之所以选择了中国作为避难所，主要是因为中俄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前人为后来者提供了成熟完备的生存基础和便利条件。





第一节

十月革命前俄人来华的历史追溯

俄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历史与中俄两国的关系史同步发展。虽然来华俄罗斯人的身份有尊有卑，地位有高有低，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都与当时关乎两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在中俄关系史上，以 1840 年为界，前期两国关系是平等的。之后，随着俄国的强大和清朝的衰落，俄国对中国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带有明显的侵略性。十月革命前在华俄国人的历史也相应地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早期来华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来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我国的元朝。13 世纪，我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不仅统一了中原，建立了元朝，还控制着罗斯及西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建立了“金帐汗国”。罗斯受制于蒙古鞑靼人的时间长达 240 年（1240—1480 年）。当蒙古统治在中原土崩瓦解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在罗斯的统治还延续了一百多年。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俄罗斯民族开始进入中国。

根据《元史》的记载，在 1330 年就有大批俄罗斯人为我国戍边、屯田。作为蒙古帝国的中心，元朝政府在北京设有“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负责管理俄罗斯军人。^① 这就是最早的大批出现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从此，揭开了两国人民交往的序幕。

1567 年，伊凡四世派遣两名哥萨克人前往中国探明情况。他们携带沙皇国书，要求拜谒中国明朝的皇帝，未被接见。1619 年，罗曼诺夫王朝又派使者到中国，虽然也没能谒见中国皇帝，但却得到了明神宗致俄国沙皇的“敕书”。自此，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外交联系。

中俄两国原本并不接壤。俄国从伊凡四世开始，历代沙皇穷

^① 参见《元史》第 3 册，770～80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兵黩武，逐渐侵略占领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土地。17 世纪下半叶，俄国不满足于对西伯利亚的占领，继续向南扩张。17 世纪 80 年代，中俄之间终于爆发了雅克萨战争。康熙皇帝御驾亲征，俘获大批俄国士兵，其中一部分俘虏被遣送到北京。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这些人被编成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地在北京东北角胡家圈胡同。

俄国汉学家尼·伊·维谢洛夫斯基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史料》中写到：“阿尔巴津人被带到北京后，立即就被编入了满洲黄旗。他们完全和满洲人一样受到尊重。给他们安排了住房，派了佣人，还规定每隔三年发给他们四时所需的衣服，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与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妇女。总之，康熙皇帝赐给了阿尔巴津人一切宽厚待遇。阿尔巴津人来北京时，携带了教堂的圣像和圣经，同时还带来了他们在阿尔巴津时的司祭马克西姆及其妻小。阿尔巴津人来到北京后，一位中国大官将自己建造的一座庙宇赠给了他们，他们就把这座庙宇改为俄罗斯人住区的索菲亚教堂。这座教堂又称尼古拉教堂，这是因为教堂里有一帧由俘虏们从阿尔巴津带来的圣者尼古拉的圣像。”^① 上面所讲到的教堂，中国人通常称为“俄罗斯馆”或“北馆”，其位置就在今天的俄罗斯驻华使馆所在地。这些阿尔巴津人经过几代之后，逐渐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以至于到了 20 世纪时，在他们的后代子孙身上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影子。

然而，阿尔巴津人的后代们对在华俄文出版事业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20 世纪初，经过多届传教士团的苦心寻觅，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找到了，开始在北京的东正教教堂里生活和工作。有些人学会了俄语，成为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和装订工人。实际上，这时候的阿尔巴津人无论是从姓氏上，还是外表、风俗习惯上，早就是中国人了。后来，随着大量俄国侨民的涌入，这些阿尔巴津人开始到天津、上海等地，给俄侨报纸提供印刷服务。他们在俄

① 转引自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4、5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